

# 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农村女性健康问题的审视与对策

□纪利娜

习近平指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必须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在此背景下,农村女性健康问题不仅是公共议题,更是衡量乡村振兴成色的重要标尺。

## “忍一忍”耽误农村女性健康

悠悠民生,健康很重要。“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的目标,这标志着届时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农村妇女“两癌”筛查投入,各地筛查覆盖率逐年提升。但筛查任务的“完成率”与群众的“知晓率”“利用率”之间仍有差距。从“政策覆盖”到“群众受益”,中间存在需要全社会共同填补的认知鸿沟——这正是持续开展健康科普、推动资源下沉的意义所在。

2023年4月至2025年12月,围绕农村妇女的主要妇科疾病,课题组开展了承德农村女性妇科健康调查。课题组深入3个县(区)8个行政村,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776份,访谈86位农村女性、6位基层医务工作者。数据显示:农村女性妇科疾病总体患病率77%,以生殖道感染、慢性盆腔炎、月经不调为常见。超过87%的女性对妇科常见病预防知识了解甚少,近70%认为“妇科病是羞耻的”而不愿主动谈及。出现妇科不适时,仅26%的人会立即去正规医院就诊,超70%选择“自行买药”或“忍一忍”——这与门诊观察完全吻合。

##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农村女性的健康弱势

从个体层面看,健康素养匮乏与信息误

导并存。智能手机普及让农村女性接触海量健康信息,但短视频平台内容良莠不齐,许多女性据此自我诊断、自行购药,既花了冤枉钱,又延误病情。而真正科学的预防知识,却因传播方式刻板难以抵达。

从家庭层面看,传统观念下的“健康排序”根深蒂固。在许多农村家庭,女性健康需求常被置于“不紧要”位置。一位患子宫肌瘤的妇女坦言:“家里大事小事都得先紧着来,我这点妇科病又不致命,拖一拖没关系。”这种心态加上部分男性缺乏科学认知、卫生习惯不予配合,导致许多本可预防的感染反复发作。

从服务层面看,基层医疗可及性不足。我们走访的乡镇卫生院中,妇科检查设备普遍简陋,专业妇科医生极度匮乏,即便配置基础设备,受限于技术能力,群众也难以信任当地结果,仍需前往县医院。但对偏远山村女性而言,往返县城动辄半天,车费加误工费成为难以跨越的门槛。

从政策落地看,惠民项目的“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国家持续加大农村妇女健康保障投入,但部分群众对政策知晓率低、理解存在偏差,加之对疾病的畏惧,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这种“基层筛不了、大医院去不起、好政策用不上”的多重困境,让许多本可早诊早治的疾病被一拖再拖。

## “四位一体”解决农村女性健康问题

根据调研情况,课题组创新提出跳出“就医疗谈健康”的局限,确立“四位一体”解决方案。

培育本土“健康大使”,让知识“接地气”。尝试在每个村选拔1-2名有威望、热心公益的妇女作为“乡村健康大使”,系统培训后,通过她们用当地方言、身边案例传播知识,同时宣传免费筛查政策和医保报销流程。

推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对于农村妇女而言,“方便”比“高端”更重要。建议推广“移动医疗车”服务,定期派遣配备超声、妇科检查设备的车辆进村,提供免费筛查和基础诊疗。建立“县管乡用”机制,让县级妇科医生

定期到乡镇卫生院坐诊带教。针对春节返乡高峰,可组织集中筛查,抓住外出务工女性回家的“窗口期”。

推动惠民政策更好落地。目前,常见妇科病诊疗项目大多已纳入医保,但对低收入家庭而言,自付部分仍构成压力。因此,好政策不仅要有,更要让群众“用得上、敢去用”。建议在现有政策框架下,优化报销流程,加大对特困家庭的医疗救助力度,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扭转观念需要全社会参与。妇科疾病的“污名化”是女性就医最大心理障碍。我们尝试开展“家庭健康总动员”,邀请夫妻、婆媳共同参加健康教育,重点对男性进行科普。

## 推动更多务实政策落地

农村妇女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她们的健康关乎家庭稳定和乡村未来。从调研情况看,还有无数女性在“忍一忍”中延误病情、在错误信息中花费冤枉钱、在惠民政策前茫然不知。因此,建议推动更多务实政策落地——将农村女性健康服务纳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保障事项,在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让移动医疗车真正跑起来,让优质资源下沉到群众家门口;让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健康大使”,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传播科学知识。

今年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主题是“权利、公正、行动:为所有妇女和女童”。对广大农村妇女而言,“权利”意味着让乡村女性有地方看病、敢去看病、看得起病;“公平”意味着让她们的健康诉求不再被置于家庭排序末端;“行动”意味着通过科普和资源下沉,让她们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只有当移动医疗车真正跑起来,当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健康大使”,当惠民政策从“听说过”变成“用得上”,“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承诺才算真正落地,乡村振兴的图景才算真正完整。

【本文系承德市社科联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承德农村妇女的主要妇科疾病调查及综合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承德市中心医院妇儿院区)

# 猪群饲养密度对生产性能的影响

□梁墨涵

在现代养猪生产中,饲养密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管理参数,它直接关系到猪群的健康状态、生长速度和养殖效益。所谓饲养密度,指的是每头猪所占有的地面面积大小,或者说一个猪栏里养多少头猪。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复杂的生理学和行为学原理。许多养殖户为了追求栏舍利用率最大化,往往倾向于增加饲养头数,却忽略了密度过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将从五个方面详细探讨猪群饲养密度对生产性能的具体影响,希望能为养猪生产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 采食空间不足拖累生长速度

饲养密度对猪的采食和增重有着最直接影响。当猪栏内猪只过多时,每头猪占有的空间变得狭小,采食行为首先当其受到影响。在采用限饲或不完全自由采食的猪场,密度过大导致饲料时出现明显的竞争和拥挤现象。强壮斗斗的猪会霸占料槽位置,不断驱赶其他猪只,导致弱小个体采食时间严重不足,摄入的饲料量远低于正常生长需求。即便在自由采食体系中,过高的密度也会因频繁干扰而打乱猪的正常采食节律,使部分猪无法安稳进食。

长期处于这种竞争压力下的猪群,采食均匀度会显著下降,直接后果就是日增重降低,个体差异拉大,出栏时间参差不齐。有的猪已经达标可以出栏,有的却还差得很远,给后续管理带来诸多不便。相反,保持适宜的饲养密度能让每头猪都拥有从容采食的空间,不需要你争我抢就能正常进食。猪只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安排采食和休息,饲料转化率也会相应提高,吃进去的饲料更多地转化为体重增长,从而保证全群均匀、快速地生长,让养殖效益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

## 争斗频繁引发慢性应激伤害

饲养密度与猪群的社会行为及应激水平密切相关。猪是具有社会性等级之分的动物,在有限空间内,它们会通过最初的争斗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啄序”关系,一旦等级明确,猪群便能恢复平静。然而,饲养密度过大会打破这种好不容易形成的社会结构,过于拥挤的环境使猪只无法有效回避冲突,也难以建立清晰的等级关系,彼此之间的摩擦和争斗反而急剧增加。

频繁发生的争斗和撕咬,表面上看只是造成猪只体表损伤,如耳朵被咬、皮肤划痕等,但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让猪长期处于慢性

应激状态。当猪持续承受社会压力和不安情绪时,体内会分泌过多的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导致新陈代谢发生紊乱,本应用于生长的能量被大量消耗在应对紧张情绪上,饲料转化率自然下降。同时,长期应激还会削弱猪的免疫功能,使其更容易受到病原体侵袭,一旦环境稍有变化或病菌入侵,这些猪往往最先倒下。相比之下,合理的饲养密度能够有效减少不必要的争斗,猪群表现出更多的躺卧和安静休息行为,整个栏舍呈现出一派平和景象。

## 环境恶化加重猪群健康负担

饲养密度对猪舍环境质量,尤其是空气和卫生状况有着决定性影响。猪只在代谢过程中会不断产生热量、水汽、二氧化碳、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以及粉尘和微生物。当饲养密度增大时,单位空间内猪只的产热量和排污量会成倍增加,如果通风系统不能相应增强,就会造成舍内温度升高,湿度加大,有害气体浓度迅速攀升。

氨气浓度过高带来的危害尤为直接,它会刺激猪的呼吸道黏膜,破坏呼吸道纤毛和黏液构成的第一道防御屏障,为病原体入侵打开方便之门,诱发呼吸道疾病。同时,潮湿污浊的环境特别适合细菌和寄生虫滋生繁殖,地面长期湿滑,垫草发霉变质,猪只体表容易沾满粪污,皮肤病的发生率也会明显提高。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猪需要消耗额外能量来抵抗不良环境影响,比如加快呼吸应对污浊空气,调动免疫系统对抗病原体,这些能量本应用于生长增重,现在却被白白消耗,导致生长速度受到抑制,饲料报酬降低。因此,饲养密度是否合适,往往首先体现在舍内空气质量上,走进猪舍闻一闻有没有刺鼻氨气味,看一看猪只是否流泪有泪斑,就能大致判断密度是否超标。

## 密度过高削弱抗病能力

饲养密度对猪的健康状况和抗病能力有着深刻影响。前面提到的环境质量下降和社会应激增加,两者叠加会共同抑制猪的免疫系统功能。现代兽医学研究表明,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的动物,其免疫应答能力会明显下降,对疫苗的反应效果变差,这意味着猪只即使按时接种了疫苗,也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保护力,抗体水平参差不齐。

在免疫力普遍降低的情况下,病原体更容易在密集的猪群中传播开来。因为猪只之间的距离缩小,接触机会成倍增多,无论是通

过呼吸道飞沫还是消化道粪口途径,病原传播的速度都会大大加快。一旦有个别猪只发病,高密度环境会使其迅速成为传染源,病原很快扩散到整个猪栏,导致全群暴发疫病。尤其是一些条件性病原体的感染,高密度往往是重要的诱发因素。例如,养猪生产中常见的猪呼吸道疾病综合征,其发生就与饲养密度过高密切相关。所以,保持合理的饲养密度不仅仅是为了让猪长得快,更是一项重要的疾病预防措施,是从源头减少病原传播机会、维持猪群高健康水平的关键管理手段。

## 空间狭小影响肢蹄健康

饲养密度还通过影响肢体健康和活动行为来改变生产性能。现代瘦肉型猪生长速度快,骨骼发育有时跟不上肌肉和体重的增长速度,本就存在一定的肢蹄脆弱性。在过高密度的饲养环境中,猪只活动空间极其有限,转身困难,长时间被迫保持某种姿势,这会大大增加肢蹄受损的风险。

如果地面再过于湿滑或粗糙,加上猪只之间频繁踩踏,很容易导致蹄部损伤、关节炎和腿部软弱无力等问题。这些肢蹄病不仅会造成疼痛,影响猪只的正常站立和采食行为,严重时还会导致淘汰率上升,直接造成经济损失。此外,空间狭小限制了猪的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能量消耗,但也可能导致猪只体质下降,肌肉和骨骼的协调性变差,看似安静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健康隐患。合理的饲养密度应当为猪只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让它们能够自由地站立、躺卧和行走,有一定的活动量能促进骨骼发育和体质增强,这样才能为后期的快速育肥打下良好基础,让猪长得快也站得稳。

猪群饲养密度是一个需要精细化管理的关键环节。从采食增重到社会行为,从环境质量到健康水平,再到肢蹄发育,密度的影响贯穿于养猪生产的全过程。过高的饲养密度虽然看似提高了栏舍利用率,但实际上往往会带来生长速度减慢、饲料转化率下降、发病率升高和死亡率增加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得不偿失。养殖户在实际生产中,不能只盯着栏舍利用率,而应根据猪的不同生长阶段、圈舍结构、通风条件以及季节变化,灵活调整饲养密度。只有在实践中找到最适合本场条件的饲养密度平衡点,才能既充分利用栏舍资源,又让猪群发挥出最佳的生产性能,实现健康养殖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作者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郑州450046)

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与“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教师作为教育变革的第一资源,其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决定转型的深度与效能。本研究通过对110名职业院校教师的问卷分析,描绘其数字素养的多维现状,诊断核心痛点与影响因素,构建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以期对相关院校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 研究现状分析

### 一、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总体特征与结构性现状

高认同、强意愿与中等偏上能力并存。数据表明,教师对数字技术的价值认同度极高(90.91%认为重要或非常重要),主动学习意愿强烈(93.64%)。然而,其数字教学实践能力(均值为3.43,标准差0.95)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能力结构中,“开展个性化指导”(3.46)相对较好,而“融合数字技术设计教学活动”(3.38)则显薄弱,反映出用工具与善用工具有优化的教学之间在鸿沟。

工具应用呈现“高阶短缺”现象。多数教师(98.18%)熟悉在线教学平台,然而,指向深度教学创新的工具应用率显著偏低:虚拟仿真(VR/AR)为42.73%,课程资源制作工具仅为19.09%。这印证了高端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能力是当前明显的短板。

学校支持系统存在显著短板。尽管多数教师认可学校提供了基础设备(78.18%)和资源库(68.18%),但关键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支持率仅为52.73%，“经费支持”更低至19.09%。14.55%的教师认为设备更新无法满足需求。可见,持续的专业发展支持与激励机制缺失已成为制约素养提升的关键外部瓶颈。

### 二、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与差异格局

个体层面:职称与项目实践是关键分水岭。方差分析显示,职称对教学实践能力有显著影响( $F=2.87, p<0.05$ ),副教授(3.58)与教授(3.62)的能力显著高于助教(3.25)。更为重要的是,是否参与过数字化课程开发成为能力的分水岭。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参与过开发的教师,其教学能力(3.68)虚拟仿真工具使用率(61.70% vs 28.57%)及对学校支持的正面感知(57.45% vs 38.10%)均显著高于未参与者( $p<0.01$ )。这表明“做中学”是数字素养生成与跃升的有效途径。

认知层面:应对数字化的信心是最强预测变量。相关性分析揭示,教师的“应对数字化挑战的信心”与教学实践能力总分相关性最高( $r=0.62, p<0.01$ ),高于价值认同( $r=0.41$ )和学习意愿( $r=0.56$ )。在后续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 $R=0.58$ ),应对信心( $\beta=0.32, p<0.01$ )依然是预测教学能力的首要因素。

组织环境层面:系统性支持与能力发展正相关。相关分析显示,学校提供的各类支持中,“培训与指导”与教师教学能力的相关度最高( $r=0.51, p<0.01$ ),其次是资源库支持( $r=0.42$ )。回归分析也确认,学校支持总分是教学能力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 $\beta=0.25, p<0.01$ )。系统、精准地组织支持,尤其是专业发展支持,能有效转化为教师的能力提升。

### 三、核心困境与真实诉求的深度挖掘

三重困境:“技术”“时间”与“资源”。分析显示,教师面临的前三位困难依次是“技术操作不熟练”(64.55%)、“时间精力有限”(56.36%)和“缺乏优质资源”(47.27%)。交叉分析进一步发现,“技术操作不熟练”在助教群体中尤为突出(78.26%),而“时间精力有限”则在承担较多教学与管理任务的讲师群体中最为凸显(62.50%)。

培训供需错位:培训“形式”与“内容”满意度低。尽管89.09%的教师参加过培训,但42.73%的人认为培训“内容实用性差”,36.36%认为“培训形式单一”。而教师最期望的培训内容前三项是:在线教学平台深度操作(77.27%)、人工智能教学应用(65.45%)、数字化课程开发(64.55%)。在培训形式上,线下集中培训(77.27%)是最强偏好。这表明,现有培训与教师的真实需求存在明显落差。

政策诉求:呼唤“资金”“机制”与“共同体”。对开放建议的文本分析发现,“培训”“实践”“资金/经费”“支持”是高频词。教师的呼吁集中于三点:一是增加常态化、实操性的经费与资源投入;二是建立将数字素养成果与职称评审、绩效考核挂钩的激励机制;三是构建教师学习与实践共同体,通过团队协作、校企合作、专家指导打破个体探索的局限。

## 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揭示,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是一个涉及个体、实践与组织系统的复杂工程,不能依赖单一培训,而需构建一个协同作用的生态系统。基于此,本文提出“三维协同”提升路径。

### 一、实施“精准滴灌”,构建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

针对“供需错位”问题,培训必须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首先,进行精准画像与分层:将教师区分为“实践引领型”(高能力高参与)、“意愿积极型”(高意愿低技能)和“支持薄弱型”(低支持低参与)。其次,设计差异化内容:对“引领型”教师,侧重AI教育应用、数据决策等前沿内容,赋予其培训师角色;对“积极型”教师,重点加强虚拟仿真、资源制作等实操技能;对“薄弱型”教师,需从基础工具和降低焦虑入手,提供“一对一”帮扶。最后,采用混合式组织形式,以教师偏好的线下工作坊、校企实践为主,线上资源库为辅,确保培训“有用、能用、好用”。

### 二、推动“生态重塑”,完善院校支持与激励机制

学校必须从“资源提供者”转变为“生态构建者”。硬件层面,优先升级智慧教室和虚拟仿真实训平台,破解高端工具普及率低的瓶颈。资源层面,建设校本数字化教学案例库与优质资源库,直接回应47.27%教师对优质资源的渴求。制度层面,设立“数字化教学创新奖”,并将数字教学成果明确纳入职称评审与绩效考核,从根源上激励教师投入。管理层面,为教师“减负”,保障其技术学习与创新的时间,解决“时间精力有限”这一最大现实约束。

### 三、促进“共同体赋能”,激发教师自主发展内驱力

教师的持续动力来源于自身。院校应积极孵化数字化教学实践共同体,围绕真实任务,组建跨学科、跨校际的教师团队。通过定期研讨、集体备课、成果展示,营造“同伴互助、经验共享”的文化氛围。同时,鼓励教师制定个人数字专业发展计划,将参与共同体活动、进行教学反思与创新作为自主发展的核心路径。以此提升个体的应对信心,规模化优秀实践经验,形成“优秀引领、全体进步”的良性循环。

## 结论

研究表明,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正处于从“工具普及”迈向“深度融合”的关键爬坡期,其发展并非单纯的技术赋能,而是一个深受个体效能感、项目实践深度以及学校支持生态系统综合影响的复杂过程。因此,未来的工作重心应从关注“有无”转向关注“优劣”,从提供“单一培训”转向构建“支持生态”。通过“精准滴灌式培训”解决能力短板,通过“院校生态重塑”破除环境制约,通过“实践共同体赋能”激活内生动力,三者协同发力,方能系统、有效地提升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的数字素养,真正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大而持久的师资动能。

【本文系2025年度毕节市职业教育研究课题(联合课题)“数字化背景下高职职产专业的教学模式改革研究”(项目编号:BJZYJYKY-2025-06)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毕节 551700)

编辑邮箱:abcd418@126.com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及提升路径

□潘红霞 宋沉思 聂珊